

文化融合与延续：

11-13 世纪藏传佛教在
西夏的传播与发展

崔红芬 著

民族出版社



效
蠟
刻
彫
鐫
鏤
鐫
刻
彫
鐫
鏤
鐫
刻
彫
鐫
鏤
鐫
刻
彫
鐫
鏤

韞
綉
紵
疋
絹
緞
綺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縠

文化融合与延续：

11-13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

崔红芬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融合与延续:11—13 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
崔红芬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7

ISBN 978 - 7 - 105 - 13304 - 8

I. ①文… II. ①崔… III. ①喇嘛宗—佛教史—研究—
中国—西夏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0367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德庆央珍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420 千字

印 张:11

定 价:3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304 - 8/B · 625(汉 23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懈駮殺辨甄黠倏諳熈隨韶灑繼芻黠黠怗禡禡禡禡

死甫殺後反認錯辨絳懈甄禡 繆辨

繆嫩禡韶媿黠甄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

辨甄懈

辨熈禡韶甄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

辨熈禡韶甄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禡

内容简介

本研究从党项部落生活的地域，党项与吐蕃的历史渊源，西夏王国与周边吐蕃政权的关系，西夏境内民族成分，河西地区悠久的藏传佛教发展传统等方面入手，详细地分析了党项部落在内迁前就开始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到西夏国建立后，卫藏地区的佛教再次兴盛，金刚乘密教得到很大发展，藏传佛教继续对党项人产生着影响，且非常深远。可以说藏传佛教在西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寺院是信众礼佛和进行法事活动的场所，书稿对传播藏传佛教的西夏寺院进行初步考证，并对藏族僧人在西夏弘传、翻译佛经和参加的法事活动进行阐述。藏传佛教发展到后弘期，因传承、修持密法的差异和依附不同地方势力，逐渐形成了很多宗派，为了弘扬教义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不同宗派僧人纷纷来到西夏从事译经和各类佛事活动，不同宗派的思想在西夏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观音信仰在藏地十分兴盛，从西夏遗存物看，有关观音的经典和绘画丰富，礼佛忏悔思想流行，充分体现了西夏藏传佛教发展世俗化的特点，且佛教艺术具有不同民族文化杂糅的特点。西夏灭亡后，大量西夏遗民为元朝廷所重用，西夏遗民的佛教信仰和在不同地区的佛事活动也为元代藏传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西夏在藏传佛教的东传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在论述西夏藏传佛教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汉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二者相互融合和吸收，可以说西夏藏传佛教既有显密结合的特点，又有汉藏文化相融合的成分。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藏传佛教简述	(1)
第二节 选题动机及研究内容	(7)
一、选题动机	(7)
二、研究内容	(9)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回顾	(10)
一、国外研究状况	(11)
二、国内研究状况	(19)
第一章 藏传佛教传入西夏的条件及年代	(29)
第一节 党项与吐蕃的历史渊源	(30)
一、早期交往	(30)
二、互通婚姻	(36)
三、佛教交流	(38)
第二节 吐蕃对河西的长期统治与藏传佛教的传播	(40)
第三节 吐蕃、回鹘对党项的影响	(42)
一、凉州吐蕃政权对党项的影响	(42)
二、回鹘政权对党项的影响	(45)
第四节 河湟吐蕃与西夏的关系	(48)
第五节 藏传佛教传入西夏考	(52)

一、对译自藏文经典的考证	(52)
二、对《华严忏仪》题记的考证	(54)
三、碑名的记述	(56)
四、对藏传绘画特征的考证	(57)
第二章 西夏藏传佛教寺院与僧人	(60)
第一节 藏传佛教寺院与石窟寺	(61)
第二节 藏族僧人的习俗及度僧	(76)
一、藏族僧人的习俗对西夏的影响	(76)
二、西夏度僧制度	(81)
三、对僧尼的监管	(86)
第三节 西夏高僧及其活动	(90)
一、帝师	(90)
二、国师	(106)
三、法师与禅师	(123)
四、未见有封号的僧人	(135)
第四节 藏族僧人对西夏的贡献	(137)
一、佛教方面	(137)
二、世俗方面	(138)
第三章 藏传佛教宗派与经籍在西夏的传播与影响	(141)
第一节 藏传佛教宗派在西夏的传播	(141)
一、噶当派 (bka'-gdams pa)	(141)
二、噶举派 (dkar-brgyud 或 bka' -brgyud)	(144)
三、萨迦派 (sa-skyapa)	(156)
四、宁玛派 (mnying ma-pa)	(161)
第二节 禅思想在西夏的发展	(163)
第三节 西夏藏传佛教典籍的来源及修习仪轨	(171)

一、藏传佛教经典来源	(171)
二、藏传佛教密宗经典	(176)
三、西夏僧人修习仪轨	(181)
第四章 藏传佛教信仰的大众化	(189)
第一节 观世音信仰及其经典的流行	(190)
一、观世音绘画	(192)
二、观世音经变	(195)
三、观世音经典	(197)
第二节 净土信仰及其经典的流行	(205)
一、阿弥陀净土信仰	(206)
二、东方药师净土信仰	(210)
第三节 佛顶尊胜的流行与文殊信仰	(213)
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流行	(213)
二、文殊信仰	(216)
第四节 护法思想与北方天王信仰	(218)
第五节 礼佛斋忏思想的流行	(223)
第六节 《密咒圆因往生集》内容分析	(226)
第五章 西夏藏传佛教艺术	(232)
第一节 西夏藏式佛塔	(232)
一、藏式佛塔的类型与分布	(232)
二、多种功用的藏式佛塔	(241)
第二节 藏传佛教绘画	(247)
一、藏式佛画	(248)
二、曼陀罗画	(252)
三、法器和供品	(270)
第三节 藏式塑像及擦擦	(274)

文化融合与延续：11—13 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

一、塑像与雕像	(274)
二、擦擦	(279)
第四节 西夏藏传佛教艺术的特点	(283)
一、多文化的完美融合	(284)
二、世俗内容增加	(287)
三、色彩和金饰的使用	(289)
四、绘画内容简明	(290)
第六章 西夏藏传佛教对后世的影响	(292)
第一节 元明继续刊印西夏文大藏经	(293)
一、元代私人刊印西夏文佛经	(294)
二、元官方刊印西夏文佛经	(294)
三、明代刊印西夏文佛经	(298)
第二节 西夏遗民的佛事活动对后世的影响	(299)
一、西夏遗民在河西的佛事活动	(300)
二、西夏遗民在藏地的佛事活动	(303)
三、西夏遗民在河北等地的佛事活动	(306)
四、西夏遗民在南方的佛事活动	(308)
五、宣政院供职的西夏遗民	(313)
六、西夏帝师对元代的影响	(315)
结 语	(318)
参考文献	(327)
后 记	(343)

绪 论

第一节 藏传佛教简述

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分两个主要阶段，藏文史籍一般称“前弘期”和“后弘期”。藏传佛教是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见行并重，并吸收了苯教的某些元素。藏传显宗教理的传授与探讨特别注重口头的立宗辩论，辩论时严格按照因明学的规矩进行，辨析精细入微，为其他各系佛学少有。藏传密宗一般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而各宗派多以无上瑜伽部的各种教授为主要修行法门。因为藏传佛教内容非常庞杂和深奥，本研究论及的西夏藏传佛教是与藏族有密切关系的，不仅仅局限于藏传佛教的密宗方面，还包含藏传佛教显宗的相关内容。

六至七世纪，印度佛教接受和吸收印度教或婆罗门教的某些内容而逐渐密教化，著作日渐丰富。随着佛教对外传播，传入中原、吐蕃地区的佛教也呈现密教化的特点。密教是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其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受结契印、心作观想，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推崇《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和《金刚顶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即《金刚顶经》）等。

印度佛教密教化之际，正是藏族开始接受佛教之时，佛教从汉地和印度、尼泊尔等地传入藏地，既有显宗内容，也有密宗成分。由于藏地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等背景，可以说藏族最初接受的佛教已经有很多的密教成分。藏族对密教接受的同时，也并没有拒绝汉地佛教，所以藏传佛教从一开始就具有显密兼容的特色。从七世纪吐蕃开始接受佛教起，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虽经历曲折，但在历代赞普的大力支持下总体得到迅速发展，直到吐蕃赞普朗达玛执政时期，扶植苯教，打击佛教，使佛教在藏地中心地区的僧团组织 and 戒律被中断。可在边远地区或在家修行者中仍以父子或师徒相承的方式继续秘密修持佛教密法，使得一些佛教密法、经书、佛像等保存和流行下来。藏传佛教以朗达玛灭佛为界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一般把七至九世纪的藏传佛教称为前弘期。十世纪末佛教在藏地再次兴盛，主要从西部阿里地区和东部安多地区上下两路拉开了复兴藏传佛教的序幕，藏传佛教的发展则进入后弘期。

佛教最初传入藏地与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有一定关系。为了发展佛教，吐蕃统治者还向中原王朝延请僧人来藏地弘法和请赐佛经。而此时汉地佛教包含很多密教成分，汉地密教到唐朝得到很大程度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八世纪初，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后，翻译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主的印度金刚乘体系的众多密教经典，直接推动密教发展，并建立起密宗，使密宗在汉地也得到传播。

与此同时，吐蕃也积极从印度、尼泊尔等地礼请僧人。据《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时派遣吞弥去天竺学习文字和大乘经典。他学成后携大乘佛典等返回吐蕃，他创制文字，为吐蕃翻译佛经奠定了基础。“继而迎请天竺、尼泊尔诸贤者，广译佛经。天竺的阿闍黎古萨热、婆罗门香嘎、迦什弥罗之达努、泥婆罗之尸罗曼殊、汉地和尚玛哈德瓦茨（即旧译之达寿天和尚）等，均来至吐蕃。”译师吞弥桑布扎及其弟子达磨郭霞以及拉隆多吉贝翻译了：

《集宝顶经陀罗尼》、《月灯经》、《宝云经》、《十万颂般若经》等，主要之经尚有《观音经续二十一种》等。^① 值得一提的是，在松赞干布时表现观世音菩萨功德的观音显密二十一部经卷即被译成藏文，可见观世音菩萨信仰与吐蕃的渊源关系。与此同时，吐蕃还从天竺、尼泊尔和汉地分别迎请三尊佛像，认为佛像所在之处，大乘佛法则能显扬，反映了大乘佛教在吐蕃兴起。赤松德赞执政时，不仅吐蕃国力进入巅峰时期，而且佛教也得到空前发展。赤德祖赞时，吐蕃遂派使往冈底斯山，请佛密与佛寂两大班智达来藏宏法，二师迎而未至。使者仅熟读五部大乘经典，归后写成五大卷函，王为之修建五寺而供之。其五寺：扎玛珍桑、扎玛格如、桑喀扎、秦浦那若、玛莎贡。自唐都京师翻译《金光明经》、《毗奈耶分品疏》及少部分医药典籍。自李域迎请出家沙门，对之恭敬承侍，并派桑喜到汉地取经。^② 赤松德赞曾派巴塞囊去尼泊尔迎请中观瑜伽行派的创立人寂护（又名静命、菩提萨埵）等人藏传法。在吐蕃，寂护开创了大乘佛教显宗中观思想，主要宣讲佛教十善法、十八界和十二缘起等佛教的基本教义。寂护入藏传法受到来自苯教的很大阻力，他被迫回尼泊尔。他回尼泊尔时，曾向赞普建议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弘法。莲花生大师是印度金刚乘的始祖、奥利萨国王因陀罗菩底的孩子、寂护的妹夫。莲花生入藏后，通过法术降伏了苯教神灵，使之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莲花生对佛教在吐蕃立足，尤其是密宗在吐蕃的传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之后，吐蕃赞普再次迎请寂护进藏与莲花生一起弘扬佛法。他们一面弘传佛法，另一面倡建桑耶寺，并以桑耶寺为中心翻译显密佛经和剃度僧人，推动了吐蕃

① 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二），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1）。

②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34、3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显密佛教的发展。寂护和莲花生分别为藏传佛教显宗和密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赤松德赞又迎请阿闍黎大咒师法称、无垢友、佛密、静藏等诸天竺班智达多人来藏。法称依瑜伽金刚曼陀罗传授灌顶等。无垢友及其余诸大阿闍黎，亦为少数已成法器的人随其所应以教授。并派遣“七觉士”之一的毗茹札那去印度学法，学成回吐蕃传授密法，成为赤松德赞时二十五名密宗大成就者之一。

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后，又从汉地迎请摩诃衍为首的和尚进入藏地传法，摩诃衍倡导一种简便易行的修持方法，得到吐蕃出家僧人和世俗百姓的欣赏，信徒日益增多。以汉地和尚摩诃衍为首的“顿门派”和以印度僧人莲花戒为首的“渐门派”发生冲突，导致了一场“渐顿之争”的辩论，结果印度僧人获胜，为“渐门派”思想传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从此赞普颁布命令，吐蕃僧人不准修习顿门派之法，奉行十法行和六波罗蜜多，遵循律学；在密宗方面，除了修持事、行、瑜伽三续外，无上瑜伽续暂不多译。实际上，仅从宗教本身来说，顿渐之争是汉藏文化交流方面的一件大事。赤松德赞时期是汉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不断交流的时期，而其中以汉禅师摩诃衍入藏达到高潮，由摩诃衍等汉地禅师将汉地特有的禅宗学说传到吐蕃宗教界，并从此影响到西藏佛教中的某些宗派，且流传后世。前弘期藏传佛教的显宗和密宗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无上瑜伽思想尚未得到流行。

十世纪，佛教逐渐由安多、阿里等地传到卫藏地区。同时有一些人去印度求法，其中最有成绩的是仁钦桑波（rin-chen-bzang-bo, 958—1055），译出以密宗为主的不少显密经典。又从印度迎请阿底峡进藏，主要传授显宗教理，兼及密宗。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从十一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

藏传佛教后弘期正好是印度波罗王朝无上瑜伽的流行时期。阿

里王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信奉佛教，吸引了很多印度僧人前来传法，而且还派遣青年人去印度学习《集密》和《时轮经》等，他们回藏地翻译密教经典，传播金刚乘密法，为后弘期密教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建立，先后出现了噶当派、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以及后来的格鲁派等，这些教派中除噶当以显为主外，基本上都遵循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

作为佛教比较兴盛的河西地区，对汉、藏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有关陀罗尼密教的典籍已经在河西地区翻译成汉文，推动了陀罗尼咒术的流行，主要代表人物有竺法护和昙无讖等。与此同时，在莫高窟绘画中也出现一些形象诡异的护法诸天，极可能是密教形象最早传播的遗迹。及至唐宋时期，佛教，尤其是密教在河西地区得到发展，这主要与不空在河西地区的传法活动和藏族人对河西的统治有密切关系。天宝十二年（753）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上奏唐玄宗，请求让不空到河西“请福疆场”，不空从岭南来到长安，后又赴河西，来到武威，住开元寺，设坛灌顶，开设译场，弘扬密教，为汉传密教在河西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对唐朝进行大规模进攻，先后占领河西、陇右大部分地区。吐蕃人对河西进行了长达七八十年的统治，吐蕃人信仰的藏传佛教对河西地区产生很大影响。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即汉藏密教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一些译师的译经活动更加促进了双方的交流，远的且不说，仅在吐蕃和归义军时期，著名藏族僧人法成（Vgos chos-grub）就对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法成来到敦煌，先住沙州永康寺，后到甘州住修多寺，又回到沙州住开元寺翻译佛典和弘传佛法。法成将汉文经典译成藏文也把藏文经典翻译成汉文，并从事讲经弘法活动。他翻译、注疏、著述和宣讲佛经等近四十部，有显宗的，也有密宗的。据王尧先生考证，法成由汉文译成藏文的有：《金光明最胜王

经》、《解深密经疏》、《入楞伽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大宝积经》、《佛说时非时经》、《锡杖经》、《千手千眼陀罗尼》、《观音陀罗尼经》、《十一面神咒心经》、《百字论颂》、《缘生三十颂》和《八转声颂》等；由藏文译成汉文的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等。集成或讲述的经籍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芋经随听手镜记》、《瑜伽师地论》等。^①这其中很多经籍，如观音经和星曜崇拜经典在河西地区早已流传开来，并对藏地及以后的西夏产生深远影响。

可见，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吐蕃本土佛教与河西地区的佛教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融合，使河西地区佛教具有汉藏等不同文化的特点。藏密经典、陀罗尼和汉传密宗典籍在河西地区都流行发展开来，这种情况对以后的西夏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夏是我国古代在西北地区以党项人为主体的一个民族政权，由于受地域和境内民族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党项人与藏族有着密切关系，藏传佛教发展的前弘期和后弘期也正是党项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以至建立国家的时期，党项民族与藏族密切接触，深受藏族宗教文化的影响，为党项人接受藏传佛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受藏族文化影响，藏传佛教在西夏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译自藏文的经籍、陀罗尼真言被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在西夏境内广为流行。为了适应民众诵经念咒的需要，在西夏还流行以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且在刊印的佛经前加进陀罗尼，诵正经前，先诵佛咒，很多陀罗尼还独立成篇，单独流行。另一方面党项人也与汉族文化有着比较默契的联系，尤其党项部落内迁以后，与中原政权有着更多交往，从德明到秉常时期先后六次向宋朝请赐佛经，为佛经在西夏境内的传播提供了前提。另外，西夏僧人还自己编撰咒语，即

^① 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17～34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密咒圆因往生集》以满足境内信徒的需求。信众认为陀罗尼真言虽然字数较少，却有无尽的法力，高深莫测，其功效甚至超过本经数万倍。大量陀罗尼的出现是河西地区佛教发展的总趋势，且与密教的发展和宣说密不可分。在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大量而珍贵的佛教文献就充分证明了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和影响。党项人接受的藏传佛教实际上已融合进很多汉文化因素，所以说西夏藏传佛教既有显密结合的特色，又有藏汉文化相融合的成分。

第二节 选题动机及研究内容

一、选题动机

西夏是党项在西北建立的民族政权，史料记载党项成为“党项羌”、“三苗之后”、“西汉羌之别种（遗种）”；或称党项拓跋民出于鲜卑拓跋氏，与元魏同出。隋唐时期，党项族生活范围东边为松州（今四川松潘），西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即今青海、四川交界处的果洛、阿坎藏族自治州地区，北连吐谷浑。内迁前，党项与羌族、鲜卑、汉和突厥为邻或杂居局面。内迁后，经过长期发展，党项逐渐强大，在西北建立西夏政权，其境内仍然生活着汉、回鹘、藏等不同民族，由于西夏所处地理环境、民族因素和历史渊源等，与吐蕃关系密切，西夏境内藏传佛教也十分兴盛。

在西夏的考古史上有多次重大发现。如1908—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四川—蒙古探险考察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西夏故城黑水城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时期的文物和文献，分别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这批文献以佛教文献为主，约占90%以上，它们被运

抵俄国以后，一些佛学家和汉学家立即着手对这批文献文物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编目和研究。1914 年英国人斯坦因率领的考察队在黑水城也获得一些文物，这批文献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1917 年，灵武知县余鼎铭在灵武又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这批经卷目前主要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少数藏于日本和中国甘肃、银川等地的私人手中。1990 年贺兰山拜寺沟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从中又清理出大量的西夏文佛经等文献。其中，方塔中出土的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属海内孤本。在贺兰县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山嘴沟石窟寺和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等处还发现一些佛经、佛画、唐卡、塑像、擦擦等。在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岷山洞、武威西夏墓中也出土了西夏文、汉文和藏文的佛经、帛画、文书、占卜辞等。另外，在莫高窟北区还出土了一些西夏时期的佛经等，主要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在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文殊山万佛洞等发现 100 多个西夏时期新开凿洞窟或重新装奁过的前代洞窟及一些保存下来的西夏碑刻等。这些考古发掘都为研究西夏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政治制度和佛教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极丰富的宝贵资料。由于大量西夏资料流失海外，给我们研究西夏学带来了诸多不便，但这也促使中外学者对西夏学领域的共同研究和探讨，从而使西夏学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的机会。

近些年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公布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诸位前贤在西夏学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石窟考古、石窟艺术、藏传绘画与唐卡、佛经的编目、佛经的译释和佛教史等领域，为我们继续从事西夏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此同时，限于材料和条件，前人对西夏佛教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西夏藏传佛教发展和传播的整体状况的研究仍显薄弱。即使前人涉及的领域，有些观点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和考证，有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本课题